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二期 ——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8d)

【人物追踪】杨小凯和他的“传奇”	陈小雅
【峥嵘岁月】拦截国际列车	陶铁柱
【往事追忆】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	曹为平
【人物春秋】邓拓与毛泽东	傅国涌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追踪】

杨小凯和他的“传奇”

• 陈小雅 •

小凯去世，有三位朋友来信说，你应该为他写一点什么……

我长大后，真正与小凯只见过一面，但两家或亲友的关系，算来也有40多年。

我父亲与小凯的父亲，都曾是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下级。我父亲算“红区党”，他父亲算“白区党”。

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曾在同一个大院里渡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小凯的父亲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大概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甄别平反”。对此，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留下一首《声声慢·七千人大会》：

时时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线，最难分析。

三番两次遇着，不识它、转移规律。
事过也，再回头，却是明明白白。
天下兴亡有责。
应记取，刍尧之言堪则。
众志成城，总要定谋决策。
鞠躬尽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家传”对小凯“忧国忧民”情怀、“英雄主义”气质的最早影响。但是，小凯说他少年时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给人带来的屈辱，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的小凯，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哥哥同学。但我对这位长我七岁的大男孩毫无印象。不过，他的大名却如雷贯耳。所闻大约是“成绩好”、“聪明”一类。当时的长沙市一中，是个省委和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中出政治家；附中出教授和文学艺术家。可见当时长沙市一中的政治氛围，学生对国事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这种特色，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产物。

文革前，我们家已离开湖南。再次听到小凯的消息也是在家中的饭桌上。当时，我哥哥还拿出一张传单，来自湖南。我感觉有点遥远。而且印象中长沙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似乎在孤军奋斗……——既然共产党里已经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着“产业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不知何时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最近，看小凯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他仍以信用的语调使用了这个“概念”，说明马义的原教旨形态仍活在他的意识中。在马义的“政党学说”中，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既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失掉了“尖端”还有“平台”，失掉了“平台”还有“基座”，失掉了“基座”还有“根”。我们如今似乎又回到了根，但这个根在一定条件下仍能生长回去。

对于小凯的这段经历应当如何评价，现在看来，尤其在海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在他父亲那里，小凯并没有今人看得那么“成熟”。小凯父亲说：

小凯，原名曦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十八岁……和当时许多“红卫兵”一样，他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不因父母已被打成“走资派”而有所犹疑。他自幼好学深思，在校是高才生，共青团干部。随着运动发展，他开始思索国家的命运前途。以他幼稚的心灵，在当时条件下，当然无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而更多地是受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许多极左、极荒唐文章的影响。他从这些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文件和文章中，从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揣摩领袖的意图，揣摩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改造成什么模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一张《中国向何处去》的传单，作为当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报”油印散发，从此闯下大祸。……

当时社会上奇谈怪论、无端攻击、散布种种“内部消息”、“首长谈话”的传单满街都是，多如牛毛，小凯的传单不过多引用几条马列语句，也有他的一些幼稚思想。然而这却给了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和湖南省领导机关——省革筹直至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之流一个机会。他们抓住这张传单作靶子，用以打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省无联”，并借此批判所谓“极左思潮”。而其实，陈、康之流才是极左祸首。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它的“反革命纲领”。实际上，“省无联”和许多群众组织一样，只知挥动毛主席语录本，哪里有什么“反革命纲领”！而且小凯的传单纯粹是个人所为，与“省无联”毫无

关系。康生则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怎能写出这样的传单，一定有后台，要抓黑后台”。于是，湖南省革筹极力贯彻陈伯达和康生的旨意，宣布取缔“省无联”，将“省无联”头头投入监狱。杨小凯也被抓起来，定为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又大挖“黑后台”，陈素（小凯的母亲——引者注）被逼致死，我也受尽批斗折磨。我们一家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载杨第甫诗集《世纪回眸》，香港华光报业公司，1998年7月版）

而在事发当时，我感觉到的是：连大人都在谈论小凯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把握那篇檄文的背景和含义，但是“少年取其雄武”——隐约之间，小凯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许正因为小凯的存在，我对文革中的“极左青年”也怀着某种“惻隐之心”。我相信他们总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小凯成了第一个和我联络的人。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也许是78年），我的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赴京前，他们作了彻夜长谈。从这位同学那里，我得知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手”。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或数理经济）。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因巨大“不公”而在内心唤起巨大波澜。我意识到，那个“断手”，身怀绝技，背负冤屈，临死前还把所学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何等无私、何等纯洁、何等高尚的人类情怀！！

我意识到，小凯是幸运的。大多数人从牢狱生涯中学到的是很多坏东西，而他却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难友，以小凯的兴趣、聪明和既有资源，他很可能从政。而那绝对是前途莫测，也绝对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后来这样的贡献，取得今天他所享有的荣誉的。小凯能把定“机遇”——识时务——乃属“鼠”者之特性也！

同时，我也为那位前辈感到庆幸：

你没有看错人！小凯没有辜负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凯时，所特别要提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时来运转的小凯为什么会去写一本《牛鬼蛇神录》，并说，他的灵魂，永远是和那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的！

近读小凯父亲的诗作，小凯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得到了佐证。在一首题为《送小凯（杨曦光）出国留学》的诗中，小凯的父亲写道：

炉灰沙土俱堪用，难友徒人各有长。左右逢源艰苦学，为求深造渡重洋。

——其中提到“难友徒人”、“艰苦学”大概就是当时小凯际遇的写照。而“炉灰沙土”恐怕就是他学习的“文具”了！在该诗的注释中，杨第甫还提到：

小凯……竟然在十年劳改之余，求助于一些同牢难友（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自学了英语、数学和经济学等大学课程。

——这也证实，小凯的数理经济基础，确实是在这一阶段打下的。

赴京前，小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学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

把这个故事传下去。我的那位同学也曾发愤，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断手》！而那时，正是“伤痕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那位同学那里，我还知道小凯刚刚娶妻。太太就是他“师傅”的女儿。至于是哪位“师傅”，我没有考证。我当时的直感是：小凯多么高尚！

近看一些悼念小凯的文章，对小凯此后的一段经历描述不一。有人认为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甚至拿了学位，有人称他只是“借调”，社科院连个“助教”也没给他。从小凯父亲的叙述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

刑满释放后，他去湖南大学旁听一年，然后在省新华印刷二厂当外文校对。其中写出几篇经济学论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录取。但有几位著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乃以借调方式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武汉大学破格聘他为讲师。不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邹至庄教授到武汉讲学，看中小凯的论文和讲义，认为是可造之才，邀他去美深造。但“政治问题”未解决，考研究生尚且不能，遑论出国。

……

小凯出狱后，一直对判决不服，多次提出申诉，直至向中共中央告状。

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班子调整，胡耀邦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小凯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在中组部过问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结果是定性未变，改为免于刑事处分，即杨曦光仍然有罪，只不过不该判这么长徒刑罢了。小凯当然不服，又连续申诉，其时中共湖南省委几位书记和机构改革时派来湖南的中央工作组都先后阅看小凯一案全部材料，均认为应再次复查。中组部和省委一位领导人都指示法院应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依法复查处理，外界不得干预。

一九八三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复查，经合议庭合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均认为此案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部材料充分反映杨曦光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认定原一、二审判决定性不当，应予撤销，宣告无罪。至此，从法律角度就，此案已经彻底平反。遗憾的是，法院以为原案是省委领导交办的，现在平反，也应报省委批准。报批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硬是卡着不批，拖着不办。

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是国务院聘请的顾问，因久不见小凯消息，就写信向国务院总理反映。武汉大学接国务院批示后，派人来湖南了解情况，看了案卷，抄录了法院的复查结论及向省委的报告，认为已足够说明和解决杨小凯的问题了。武汉大学据此通过对他的政审，办理了出国手续。

一九八三年八月，小凯终于拿到签证出国就读。

——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我得知，小凯进社科院，先是得他父亲的故旧李锐先生——当时已复出在中组部工作——的推荐，以后被于光远看中。也是通过帅孟奇和朱九思的关照，小凯后来得以到武汉大学任教。至于他与邹至庄的关系，很可能是小凯先帮助邹成为了中国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客，然后才是邹录取了小凯。总之，小凯一生的“传奇”，离不开他的天生资质、后天勤奋，也离不开“贵人相助”，今天，也该是这个谜底可以揭开的时候了。

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在北京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见到小凯。他

瘦小的身材让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记得我们谈过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想来还觉得狼狈的：

因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会削苹果皮。为了招待小凯，我横切竖剥地将一个削下来，那苹果早已没了形状，颜色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旁看得着急的他曾试图夺刀，我不给。他唉声叹气，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苹果，三口两口地吃了下去……

看来是坐过牢的人，还能将就！但以后我却无心再和他聊天了……——自己不得体，却怠慢别人——我想，小凯如果兴致好的话，是会把这个笑话带到天堂的！而如今想来，他是那样的体恤别人，尊重别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后十年无事。一次，偶尔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读到一篇王珞与小凯合写的《论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虽然我不能理解，57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学生怎么能“连”到一起？但我想，小凯每言定会是有本本的。1993年10月，我开始着手《八九民运史》的写作，此时，我心中想到的仅仅是两个和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一个是我们政治学所的老上级——严家祺；另一个就是我少儿时代的“偶像”——杨小凯。他们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写作时的参考资料。正是他的观点，使我开始系统审视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得出结论，八九年无论学生还是知识分子的诉求，在“激进”程度上均没有超过57年的右派。并仔细思考，文革与八九民运的共同之处。加之参考了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在《史》的序言中，我留下了这样两段文字：

一、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作为整体，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1989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物：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

二、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革命。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

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80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载《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5年6月版）

书出之后，我第一个得到的海外反馈就是小凯传来的：

——你这个“黄毛丫头”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你人在国内，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

他认为我今后应该到海外去作研究。从那以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小圈圈”开始定期询问我的状况；我的装备也迅速地改善……总之，在他少年时代的那个院子里，只有我和他的经历是与“政治”沾边的。

1996年12月，小凯从外电中得悉我终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解聘的消息，于是开始帮我筹划出国访问之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勉为其难！我不仅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外语遗忘得一塌糊涂。没关系！有朋友来帮忙捉刀。而且，就是当年为小凯准备出国文件的那一位……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小凯——感激他对于一个“小辈”的顾念。

1998年，我到荷兰后，他与鹏令也建立了很好的私谊。他们都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却很不同，有些（如文革）甚至严重分歧。但他们互相是佩服的。与通常“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同，他们甚至交换个人生活和感情方面的信息。虽然仍是远在天涯，但我觉得与这位“大哥”倒是更近了一层。

小凯说他不懂政治学，看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我觉得他还是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真谛（或称“共和”的真谛）的，那就是“制衡”的原则。不过，这个问题仍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共和”有许多层次，封建时代的“贵族共和”是一种“制衡”的结构；近代社会的“精英共和”也是一种“制衡”结构；甚至黑帮政治也有某种“制衡”功能。但这些“共和国”与下层社会的人权状况是毫不相干的。由此，我意识到，59年的小凯也许没有“下放”的经历，没有与底层社会共同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坐牢和劳改，过的也是“供给制”生活，也是与“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在一起。他在读史时，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在把“民主”和“共

和”两个要素结合起来，锻造一个新政体时那种面面俱到的深谋远虑……也许，中国第一步应该学英国，第二步仍然应该学美国？

在《基督教和宪政》一文中，他谈到对于“理性主义”的反省。我以为，这是他一生另一次思想转折的重要标志。它说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上他开始从“无限”返还到“有限”，从“功利主义”归真到“任自然”，从“事”的本体转向了“人”。说到底，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工具的性质，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加速把世界推向毁灭，只有具有了正确世界观的人，才能够人性地利用手中的“利器”。我相信，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关照下，他会将自己的经济学探索置于更宏观的考量之中，而他的人生也将更加质朴，更加愉快。可惜的是，他走得过早，他的人生经历可供“开发”与研究的另一面——在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层面的价值——还有许多将言而未言的“精彩”被带走……当然，这些都不妨碍小凯是本时代的先进分子，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最优秀的精英。我们毫无疑问，是以他的存在为骄傲的！

小凯的得病与信主，我都间有所闻。我相信，有过艰难经历的他，不仅具有坚强的毅力，而且具有自我平衡的智慧。我相信，他的精神“皈依”已是“归去”的一部分。他最终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也就卸下了一切有形与无形的负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人生能有这样的坦荡，是修炼不来的境界……

我相信，他在天堂的聚会将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他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等待我辈的归来！

□ 原载“新世纪”网站。本文原题《我所知道的杨小凯》载《北京之春》2004年七月号。2004年7月28日 修改于北京

~~~~~

【峥嵘岁月】

## 拦截国际列车

• 陶铁柱 •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不停，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7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赴满洲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6日，海拉尔市委的同志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

“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我们一一传看着电报。华山问：“你们下一步有何打算？”李建军讲了我们的计划。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有人对电报感到迷惑不解：“又是‘很好’，又是‘注意策略’，是表扬还是批判？”

华山拐弯抹角，对具体问题一概不明确答复，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在海拉尔，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

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

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南河沿111号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

□ 本文为陶铁柱写的文革回忆录《“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第一章。

~~~~~

【往事追忆】

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

• 曹为平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某日，我在学校，只有我妈与我父亲、哥哥在家，一伙暴徒涌进了我的家门，扬言要抄我的家。在门外，一伙倒大不小的孩子高喊：“打倒牛鬼蛇神！”他们先是一口咬定我舅舅王××的财物转移到我家来了。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们已有很久没有到他家去了，他也没有来过。”他们以恐吓的口吻说，他们有证据，但又拿不出来。我父亲又对他们说：“你们如要抄，完全可以抄，如果抄出东西由着你们处理。但我相信抄不出什么来。我是工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家。”在我父亲这不硬也不软的话语下，他们觉得很棘手，一时又下不了台。最后他们说他们要调查——原来他们根本就没调查过。他们说得先把我家封起来，以后再说。就

这样，我母亲只好在他们监视下，把一些随身洗换的衣物拿了出来，家里所有的箱箱柜柜都被他们贴了封条。

星期六晚上当我回到家时，家里已面目全非。

他们这一去就没有个尽头，也不知如何调查，调查没有。天气渐渐地冷了，原来拿出来的换洗衣物渐渐地单薄了。我们又不好随便开封，因为尽管我们什么都没做，一旦我们自己开封就有话说不清了。到十月，有的封条已经只剩下很小一丝联着了。怕封条断了说不清，又需要拿取衣物，我哥哥打电话去向他们反映，希望他们来一下，如尚未调查完毕封条可以补贴，我们也可以拿取一下衣物。谁知回答极其蛮横，说：“如果你们要拆封，就拆好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本还希望这是一场误会，至此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是把我们当作敌人来看待，而且不顾我们死活。天气冷了连拿一下衣服也不准。

以上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里的真实故事，只是一个小故事，至今我手里还有证据在，下面就要说到。

“这一定是红卫兵、造反派干下的好事！”一些年轻的朋友这么说。如果不是听到我父亲说我家是工人，劳动人民，暴徒们也无异议，有人还会以为我家是黑帮，地富反坏右或其他。

“这当然是红卫兵、造反派干下的好事！”那些年纪大的，对文化大革命最最深恶而痛疾之人这么说。如果换个时候，他们会一口咬定我家就是黑帮，地富反坏右或其他。

可是错了，全错了！真正地活见鬼！我才是红卫兵，我才是造反派！地地道道的红卫兵造反派！我是复旦大学最早起来造反的，六月中旬就起来造反的。而这些暴徒全是老保！

我不否定，他们袖子上都套着红箍箍，上面写着“红卫兵”。但我敢于断言，不久以前他们还在骂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直至1966.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他们才突然成了比谁都更正统的红卫兵。我也敢于断言，自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比谁都羞于提到他们曾套过这个红箍箍。我还敢于断言，他们这个红箍箍最多只套过十几天，甚至只有几天。因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就下达指示，在工厂里不成立红卫兵——他们是非法的冒牌的假红卫兵。当然，他们不套了并不等于他们这个组织不再存在了。

话也说回来，后来上海成立工总司为什么毛主席就批准了呢？工总司与红卫兵又有什么区别呢？

问题就在于，工总司是造反派。历来学生运动总是走在前面，以后才是主力军登台。1966年8月工人运动还没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所谓工人红卫兵，只能是保守组织。因此所谓工厂里不成立红卫兵，具体来说就是不准成立保守组织。而学生中，如果说红卫兵组织有的可以承认，有的不可以承认，那么尽管最先串联组织红卫兵的是造反派，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令对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一个承认一个，具体地讲就是为了承认造反派，给以组织权。而不久以前骂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的人，一下子也揩油称起了红卫兵，而且他们倒成了最正统的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红卫兵有了个罪名，叫做“攻击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黑卫兵”。

那年秋天是怎么过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妈想的办法，我忙于其它事顾不上，只要有

穿就可以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十一月份，我们并没打电话去，他们就到我家来把封条全撕了。什么理由都没说，既不说我们有罪，又不向我们道歉。把我家家具上的油漆都弄坏了，连对不起也不说一声。——原来他们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

他们走后，我们自己在家扫了一下四旧。没扫出来什么——只是，只是——现在我向大家“老实交代”，发现有一张填箱底的旧报纸，是解放前填的，那上面有蒋介石的头像。——幸亏他们没有抄，不然我们百口难辩了，他们也就得胜回朝了。

六四年我高中毕业前夕，也发现过一些旧报纸。上面写着解放前学生毕业后的悲惨遭遇，还有其他人民悲惨命运的消息。我曾经拿到学校去给同学看，作为自我阶级教育的教材。另外还有国民党吹嘘消灭共军如何如何多。我还记得，据说他们还消灭了解放军一个英雄团。这我也拿给同学看，仅作为笑料。不过如到了那些暴徒手里大概也会成为我家的罪状。

1967。1。16. 一些人押着这些暴徒到我家敲锣打鼓地来为我家平反，暴徒们在我家贴了一份道歉书。在看道歉书以前，请大家先猜猜是谁押着他们？

“是不是文化革命的反对派？”年轻人疑惑地说。

那些年纪大的，对文化大革命最最深恶而痛疾之人躲到一边去了。

又猜错了！押着他们的人是工总司，是造反派。

有文字证据。这是他们贴的道歉书。现在还在我手里。由于是道歉书，所以用的是红纸。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道歉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破四旧、抄家过程中。错误的怀疑我厂资本家王××的财物转移到王□□家中，故封了有关东西，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这是极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向王□□同志道歉！希周围革命群众周知。

致

革命敬礼！

原纺织社教二团□国针十五厂分队 1967。1。16.

这儿是以社教工作队出面，因为他们是幕后指使人。“由于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说明他们不是红卫兵、不是造反派、不是文革派。他们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并没有要他们到我家来革我们的命。我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过小小的打击，但不是受文化大革命打击，我们不是文化大革命对象。他们是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把我们这个无辜的工人家庭来顶缸。

我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说过，当洪水爆发时，你要让洪水不致淹到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另一个地方，掘开堤坝，把洪水引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是六月初他总结的复旦大学唯一没受学生冲击的三条经验之一。

毛主席称之为“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

文革中我们所以会成为造反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领导在“转移斗争大方向”。也正如此，后来有人会说我们是在包庇牛鬼蛇神，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阻力”。你看，国针十五厂的造反派不是包庇了我家这样的“牛鬼蛇神”？！

这次封我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不过，跟我受过的其它打击比，跟其他人受的更多的暴行与颠倒是非曲直比，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家住在上海复兴西路，这儿在上海称之为上只角。澳大利亚领事馆曾在我家对面。原来是法国人开的一个大旅馆。如不是毛主席来了，不是解放，我家是住不到这儿的。解放前只有有钱人才能住，因此这儿真正的牛鬼蛇神特别多。我母亲在干那种人称“吃自己饭、干大家事、受人家气”的里弄工作。对这些牛鬼蛇神有些管教。看到冒牌的红卫兵到我家来，这些人的心里一定很痛快！他们自己不会出面，于是按政策应与父母区别对待的儿女，就在我家门口大喊：“打倒牛鬼蛇神！”

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就有人说：“曹为平不对自己的家造反，在学校里反党。”

我父亲是个工人，是劳动人民家庭，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干吗要我对自己家造反呢？

不过这对我来说只算是一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打击。在我的罪行录里这只是极小的一条。

有人说，文化革命里的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有共同之处，造反派许多人出身不好。

这不是事实。我们与右派形式上相同，本质上完全不同。确实，有人动不动拿右派来吓唬我们，我们也是确实被人打成右派的，我的四大罪名第一条就是右派。但是我们受压时，右派从未来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也不会要他们来。后来造反派的名声吃香了，倒有一些右派说他们早就是造反派了，经我们比较完全不同，就把他们驳回了。后来右派帽子一风吹，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那些右派也没来说过我们一句公道话，还落井下石。

造反派也是要讲出身的，而且最先讲出身，只是没象保守派那样极端。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不少工农子弟起来贴大字报，是因为在学校里受过一些歧视，尤其在六一、六二年。还有党委重用提拔的干部大多数出身不好，有的系甚至一窝黑。——这不是五七年右派所愿意干的。那时倒有人指着工农出身同学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的确，我们的队伍里是容纳出身不好的，我与出身不好的战友关系很好。但一开始保守派里出身不好的才多，后来在内部争斗里被一些出身好的，或者据说出身好的排挤掉了。

造反派所以会被人们说成大多数出身不好，从我这个例子看就可以知道了。阿Q被枪毙当然是阿Q不好，被枪毙就是他不好的证据。同样我家如不是有罪，怎会被人封？不过这也只能算是小小的。不少人比我的处境坏得多。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造反，就会有人到他或她父母的单位里去，说此人的

儿女在学校里反党，要单位配合清查一下他或她父母的“问题”。不少单位会配合，这样，父母为儿女所累被“揪出”。然而再到学校里说，这个人的父母是什么“分子”，被他们的单位里揪出了，他或她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所以在学校里反党。这次又是儿女为父母所累了。就这样，一时间造反派里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出身不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下就都是混蛋了。

也有人到我父亲单位里去，要求对我父亲也这样办。可我父亲一贯老实本分，工作努力，四清里又吃了冤枉官司，做事缩手缩脚了。单位领导也在四清里吃了冤枉官司，同病相怜，不愿再生事端，所以没有整我父亲。我父亲虽然是个工人，由于中学里老师给我填错了出身，在文革中是不被认作红五类的，在那种气氛下当然也谈不到纠正出身。人家正巴不得把你打成黑五类呢！但和其他人比，我这点事的确是小小的了。

1967年一月是最最使某些人深恶而痛疾之的月份。

说来难怪，就以到我家抄家的人来说吧！以前他们押别人，而且可以大显威风，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尽管对他们还客气，毕竟是他们被押着，所以他们对这个一月，要深恶而痛疾之了。

说到那个一月，许多年轻人大概只知道夺权，只知道整人，而且大概会认为夺权的都是一些权迷心窍的人，整人的是一些迫害狂。其实那时我们做得最多、化时间最长的，一是劳动（这就是夺权，限于篇幅这儿不谈）、二是为人平反。我家就是得到平反的一个例子。我也在海港、在工厂为别人平反。许多受到冤屈的都来找我们平反。

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家被人抄了，到了海港找造反派要求帮助平反。海港造反派让我去调查。我找到暴徒头目，暴徒头目不但不认错，没有一点歉疚之意，反而一口一个：“我们造反派如何如何，我们造反派如何如何。”好像他只要自称造反派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开始还忍着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厉声谴责道：“你是造反派？难道我们倒是老保翻天？”此人立即闷声不开口了。有人会说：“他不是造反派吗？”——他自称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了吗？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到了革命高潮时期，什么样的乌龟王八都会自称革命者。我可以断定，两个月前，此人一定还在说造反派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到了一月，造反派名声响亮了，就一口一个：“我们造反派”，好像造反派就是象他那样的为所欲为的暴徒，把自己做下的孽事归之于造反派。为造反派抹黑，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嫁祸于造反派。凡是六六年十二月以后才自称造反派的都要认真审核，有没有攻击过造反派是什么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之类。如有这类行为的都是冒牌的，就好像所谓的工人红卫兵一样。这个人所以被我一声棒喝就不开口了，是因为他知道，我明白他是老保。尽管我对他的历史还不太清楚，但他如再这样说下去，我就要追查他的老底了，而他是经不起追查的。

后来我到另一单位去也是为别人平反。在一月，我们平反的人跟我们打倒的人比，不知多多少倍。这不是我个人才是如此，凡真正的造反派普遍如此。

暴行都是这些人做出的，——自然，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这些人再也不会自称红卫兵，也不会一口一个“我们造反派”了。到那时他们不打自招地会说他当时就是一个老保，而且历来就反对红卫兵并与造反派做了英勇的斗争的——这话除了“英勇”说不上外，倒全是事实。至于他们曾经乱抄、乱砸、乱打、乱抓的暴行自然不会再提。这些在六六年他们是作为自己的功劳和英勇行为来吹嘘的，他们只会对于无权无势者下手，尤其是从不冒风险。但到后来，就再也不会吹了。如果有人提到他们做的这类事，他们自己照例躲在一边，而由他们的同类说，这些都是文化革命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行。总之，只要认作是功劳就归于他们自己，认作是罪过就归于别人。

有个寓言《狼和小羊》，一只狼要吃一只小羊，就给他加罪名，先说他污染了水，后来又说他去年骂过它。可去年小羊还没出生呢！“不是你就是你的父亲。”狼不由分说地把小羊吃了。

这类事我看得太多了。七十年代末，有一篇文章，叫做《疯狂的节日》，说红三司在八月大抄家里把一个老教授的眼珠子打出来了。我在复旦，红三司几个头头我都认得，他们也认得我，尽管我对他们有看法（在后来，那是后来，他们中个别人也确实成了打手）。但我看到了这篇文章，不禁说道：“不可能么，我明白，这红三司是十月里成立的，八月他们还没有生呢！”——不是你就是你的父亲，有人这样说道：“反正是红卫兵、造反派。”

真是天明白！六六年八月扫四旧我们复旦除了保守派伪“红卫兵大队”外，造反派一个都没去。我们头上都有几顶帽子悬着，能不被人抄就不错了。至于带上帽子的就真的被人抄了。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给我们一条罪名叫做：“反对扫四旧”，据说还“罪责难逃”。

我们真的反对扫四旧吗？——不！我以前这个态度，后来这个态度，将来也是这个态度。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象一个三十年没打扫的牛圈，就是该好好地扫四旧了。

扫四旧最初大概就是造反派搞的，但是只是在个别事情上，根本没成规模。仅仅对于某些确实的四旧有些行动。但受到了压制，有的人是什么都不准动。为了保护造反派这些行动，六六年八月中央就在报上发表了文章。这一下就被人弄得面目全非了。

说到此又不能不说“联动”。“联动”是由一些高干子弟所组成。他们老子英雄就自然好汉。动不动就“你算老几，我父亲是几级干部。”他们倒确实是造反派，但不像我们一切都得小心翼翼。反正他们造反成功有功，错了凭着老子是几级干部，校党委书记都比不上，也不会有罪。这是一些关在保险箱里的造反派。后来随着文革深入，他们又转向了保守。北京的扫四旧风是他们刮起的，这是他们最后一个革命行动，又是第一个保守行动。

八月下旬中央在报上发表了文章后，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扫四旧的问题，我就参加了复旦学生宿舍八号楼里的一次会议。会上意见分歧，研究的就是政策界限问题。也就是说究竟什么该扫、什么不该扫？不少人以为造反派都是乱冲乱闯的鲁莽分子，正是天明白！我们头上悬着几顶帽子，稍有差错就会戴上来，万事都不能不小心翼翼。不能出一点错。正因为如此没讨论出个名堂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事不急，到运动后期分清了政策界限再说。所以都没去扫四旧。

而保守派伪“红卫兵大队”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反正他们有当权派做后盾，所扫的又是最没有抵抗力的，扫对了有功，扫错了也不会有罪，绝对安全。加上他们自称红卫兵后毕竟没有过任何革命行动需要做个样子出来，早就闻风而动一下子就去了。

那个星期六我回家，路上发现上海完全变了样。后来回到复旦我在同学中“大放厥词”。我说：“不知是谁，把北京路改称了反修路，难道我们北京修了？扫四旧不是所有的路都要改名，大多数路名其实没什么问题。”我又说：“淮海路上的商店都成了新华书店。只放毛主席著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卖什么还是要在橱窗里放什么，只是不要封资修，比如服装店只要把少爷、小姐形象改成工农兵形象就可以了。”——形象，现在叫做模特儿。我这些话不知有没有作为黑话收入我的罪行录里？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地被说成是反对扫四旧的。九月份在铺天盖地的围剿我们的大字报上就是这么说的。——正是天地良心！

就是以上这些原因，红卫兵，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最最痛恨的就是把红卫兵的历史写成扫四旧史，还有串联史，限于篇幅，后者不谈。

现在中国很难找到文革时的资料了，不少年轻人都说不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找不到那时的历史资料。其实还找什么资料？叫你相信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就是了。

听说美国倒把我们中国的红卫兵小报收全了的，看来以后人们只有到美国去研究文化大革命了。请年轻朋友记住，如果你看到一份红卫兵小报上，对于把红卫兵史写成扫四旧史与串联史抱着深恶而痛疾之的态度，那这一定就是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报纸。

1967年上海出了一出戏，写的是红卫兵史诗，叫《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在红卫兵造反派里引起了一片抗议声。因为它把红卫兵史写成了扫四旧史与串联史。后来有人与此针锋相对，搞了一部《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引起了我们的一片喝彩声。我没有参与此事，但是听说，为此而筹集经费，有人还去卖了血的。如果弄得到这时的红卫兵报纸，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要知道扫四旧的真相，还可以去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面就有个假洋鬼子扫四旧的故事。象秋瑾、夏瑜那种杀头的事假洋鬼子是绝对不会干的。但当革命推倒了清朝后，他们就急于去砸尼姑庵里的匾了。这事绝对没有风险，还把不懂事的尼姑当作保皇党打了一顿，又乘机偷走了香炉。——就是这个样子！鲁迅好像在写五十五年后的文化革命一样。我不知道该不该就此彻底否定辛亥革命？

当时假洋鬼子给我们的罪名是反对扫四旧，他们是扫四旧的英雄，这是他们的大功劳。但后来突然扫四旧成了罪行时，他们又群起而谴责，好像与他们无关，这一下一切罪行又都归于我们，我们再也不是反对扫四旧罪责难逃了！因为他们乱抄乱砸乱抓时套的红箍箍上写着红卫兵，加上我们认为扫四旧还是必要的，这就印证了乱抄乱砸乱抓的暴徒扫四旧时是我们？！

不光上海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就以我们南充来说吧！把三国时谯周的墓平毁了。当我听到有人以愤愤不平的口吻说到此事时，问他们，对答如下：

“谁干的？”

“文化革命。”

“具体是谁？”

“红卫兵。”

“究竟是什么政治态度的人？”

“造反派。”

“究竟是谁？请说个名姓。”

“林彪说是天兵天将。”

“请问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

“反正是那个时候。”

反正只是把一切往红卫兵、造反派、文化革命上一推，具体姓名是永远问不出来的。后来我知道，说到底还是那些保守派、文化大革命的反党派所干的！如正是造反派干的，早就捉了出来押上审判台并严办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总得说个张三李四吧！但这历来是讳莫如深的。没有把具体干的罪犯捉出来这中间就有鬼！

最后就把一切推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主席的身上了。好吧！就算毛主席是首恶，那么下面具体干的总有干将亲兵吧！可这些人在他们的法庭上是永远不会押出来的。如果把我们押上法庭，毕竟我们没有干过，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是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许多事都成了模糊数学。

不仅文化大革命如此。其他事也一样。

我曾经说到，我们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在五八年时如何如何搞浮夸风与共产风时。有人会突然提高了嗓门喊道：“是的！当时是这样的！”好像是我搞的，又好像我曾否定有过这类事一样。但是他们经不起我一问，当我问他们李井泉与卫广平是跟毛主席走的，还是跟某些人走的时，他们就立即开不起口了。

这些人在说到浮夸风与共产风时往往眉飞色舞，但是具体究竟是谁干的，却永远不会说出名姓来。我跟他们说，毛主席从五八年十月起，开了六次会议，写了《党内通信》，批判浮夸风与共产风，庐山会议上还点了一些人的名，其中就有四川的李井泉，他们死也不愿相信，正确说是死不认账。

在法庭上，历来是被告先要出场，并问清被告名姓的。可我们中国历来有个奇怪的法庭，具体犯罪的被告既不出庭，更不说出他们的名姓，而是一切往毛主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否则，即使现在可以蒙混人们于一时，却又怎么使后代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呢！自然，有的人是从来没有未来的，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必顾忌后代。

不过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人倒是提出来过，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人都提出来了。只是没有严加惩办，仅仅批判一下而已。

有人可能会说：“照你这样说，你们红卫兵造反派就没有整过人了？”

哪里的话？——那有搞政治不整人的？问题是谁整谁？怎样整？其行为是否确实是罪？罪证是否确实？

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人就是红卫兵造反派捉的。由此就成了迫害罪行与永久的话柄。我原在上海，怎么知道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在五八年如何如何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就是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份材料上看到的。后来有的人说：“那时我们头脑也发热，我们大家都有份。”不要以为他们有自我批评精神。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揪出来过，如不是他们的作为被揭发出来过，他们才不会说这话呢！而且照他们这种说法，开了六次会议，写了《党内通信》的毛主席和他们一起“大家都有份”，还有“我们头脑也发热”一个也字，表明为首者不是他们，而是毛主席，他们仅仅是从犯。

文革初，四川还出现了一个口号，叫做火烧百分之一百。我最初也是在那份红卫兵、造反派的材料上看到的。上面写着：“李井泉、卫广平为了反对文化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提出‘火

烧百分之一百’，打击了一大批教师。”

那么我整过人没有？

当然！没有整过人算什么红卫兵？

我不知是否有被我们冤枉的，没有感觉到，如有，我向他赔礼道歉。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明知别人无罪而强加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绝对没有干过。

我在学校里反对的就是上面说的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还有系总支书记钱孝衡。最主要是这两个。被我们拉下马后多次开过他们的批斗会。

我们绝不是象人家说的那样乱冲乱闯的人。自古以来造反是要杀头坐牢的。哪能莽撞，事实上走上造反之路是一条极其痛苦的路，经过极其严肃认真的思考的。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反对王零与钱孝衡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对他们还极其地迷信。可他们的行为实在不敢恭维。所以从最最基层起，逐渐地反到他们的头上了。

对于钱孝衡，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在六二年的困难时期，在校园里种了两棵南瓜，仅仅两棵。后来钱孝衡就在他毕业鉴定中说他是修正主义。他拒绝签字，按当时规定，拒绝签字就不予分配工作。那人就毕业等于失业了。本来，作为政治工作者，如果认为人家的行为不正——且不管是否真的不正——当时就该教育，不该不教而诛，更不该时后才跟人家算总账。南瓜又不是一天就能种出来的。但是这仅是其次。问题是他既认为种自留地是修正主义，那他自己就绝对不能种。可他自己恰恰是种自留地最最积极的人。他在系里开了一大片土地，有的时候人家向他报告工作，还得到他的地头，他还一边种一边听。可他从不说自己修正主义。这在批判会上就是他的罪状之一。算不算罪大家评论。

至于那个学生，经我们讨论，后来在六六届学生毕业时，他和另一个人一起和六六届一同分配了工作。我不知这两个人现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我们。他们确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我也不要他们感谢。不过我们包庇“修正主义”是罪证确凿了。

那个钱孝衡就是王零称赞为阶级斗争观念最强的人。他就是这么斗人的，这仅是一例。

那么王零自己呢？也举一个例子。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比他高一级又威胁到他的权力的陈传纲抛了出来。九月份，学校的保守派，伪“红卫兵大队”套上我们造反派的袖章，冒充造反派到陈传纲家里去，要他揭发王零的问题。目的正是试探陈传纲会不会向造反派提供他的问题。共去了两次，第二次去后不久，陈传纲据说就自杀了。随着有一个女保守派死在冷僻的水不盈尺的小桥流水那儿。小桥流水被悄悄地围了起来。许多人还不知为什么这儿围了。十二月，党委倒台，有人对于陈传纲之死提出了许多疑问，怀疑是谋杀。还有那个女保守派参加过冒充造反派审陈传纲。可是不久，刮来了经济主义之风，二十万工厂车站海港的保守派离开了工作岗位，尤其是作为企业指挥的机关大量人跑了。造成了企业瘫痪，我们到工厂车站海港去和工总司及其他工人抓生产，以及为人平反去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就算不是谋杀吧，陈传纲总是他们逼死的，而且干吗要冒充我们呢？象这样的行为还不卑鄙？

1983年我回上海去复旦，当时正在揪三种人，立了三个案子，居然会有两个是他们干的。三个案子为：一是罢党委的官，这是我们干的。第二是我在其他文章里说的1966。8。

6.斗鬼风，第三就是陈传纲之死。这两件都是他们干的。他们揪三种人居然会揪到自己头上！我听说后感到非常痛快，尽管知道不会对他们怎样。也确实如此，害死了陈传纲，居然只要王零作个检讨，而王零居然还可以顶着不作。

许多人都说红卫兵造反派如何如何残忍，我们真的残忍吗？

举一个例子，我是原子核物理专业，文革前，我系的放射性废物丢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王零、钱孝衡等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不久以前南京丢了放射性废物杀了人，从上到下罢了一大批官。直接责任者去坐班房。于是他们不准张扬悄悄地查。这当然不易查出来。后来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从此以后谁也不准提这件事。”这一命令居然也能够贯彻下去，可见他们对教职员工的控制了。

如果文革以前被中央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事。南京还仅仅是责任事故。可我们仅仅在批判会上说了他们一下，后来犯下这些罪行的人都出来了，王零还是做官，只是降了职。钱不清楚。

我们打过他们没有？我从没打过人，也没有看到我的战友那个打过他们。王零在我们班上，有一次下乡担粪，我负责往别人的粪箕里装。遇到王零，看到他年龄大，总要少装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残忍？

不过我们没有打过钱孝衡并不等于他没挨过打。就在我们召开的批斗会上，有人对他大打出手。急得我们叫了起来。因为批斗会是我们召开的，我们如果不制止就是我们的罪了。打手不是别人，正是钱孝衡豢养的一条恶狗。以前他帮钱咬人，现在钱倒了，他就出卖旧主子，为表现自己，反咬起旧主子来了。但是这不等于他就站到我们一边来了。我在教师中有个战友姓卢。开始因为卢写了个造反公告，就被钱孝衡打成黑小子（其实卢也不是要打倒钱孝衡）。此时这条恶狗就对卢乱咬乱吠起来。钱倒后，不再乱吠了，却一直伺机在暗中咬卢。狗是要咬人的，这一狗性是不会改的。

早在文革以前，复旦党委就准备了一份四百多人的黑名单。并派遣了一些特务暗中盯着这些人。记他们黑帐，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

本来如果别人有什么错误，作为政治工作者应随时发现随时纠正。可他们却在暗中干这些名堂。而且有的实在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还有歪曲造谣，无限上纲。

原来他们听说一九六四年北大党委在四清中倒了，紧张得不得了。于是按照王零后来总结的经验作了这个准备，以应付四清。如果以后四清清到了我校，就让那些特务以个人的名义出来，分期分批地揭发他们事先准备好顶缸的人，把他们揪斗一下，来应付四清运动，使四清走过场。

可是复旦没有四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时他们这份名单和所搜集材料就用上了，这些人果然一批批地抛了出来，也果然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我们感到不对味，与中央精神不合，起来质疑。他们就说我们是包庇牛鬼蛇神，还有什么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

这样的领导怎么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呢？尽管我们原来尊敬他们就象尊敬上帝一样。

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大量的问题不能涉及。好了，得结束了，总不能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 2 0 0 4 • 1 • 16

~~~~~

## 【人物春秋】

### 邓拓与毛泽东

• 傅国涌 •

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26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的书生办报生涯。他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1960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忠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为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1942年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1966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50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为云”到60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 （一）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对“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但“毛泽东主义”无疑为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1944年5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的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这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220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为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1949年以后，邓拓主持极为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8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1956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522页）

## （二）

好景不长。1957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30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29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1页）

邓拓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骂之后，1957年5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568—569、570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486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541页）

1957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1958年8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文革”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为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1957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61—562页）

### （三）

从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

《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一文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

……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



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531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1960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1960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 （四）

1966年5月17日深夜，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面对“叛徒”的罪名，54岁的邓拓在写完遗书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远放下了那支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笔。在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遗书中，他写道：

“……许多任务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文集》第五卷，427—428页）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文集》第五卷，432—433卷）

这是不是邓拓的真心话已经并不重要，他曾谢绝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私下还说过“伴君如伴虎”的话；在遭到毛泽东当面责骂之后，他也没有心服，留下了“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这样的话；他在胡绩伟面前指责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切都表明他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光彩的杂文，从《废弃“庸人政治”》到《专治“健忘症”》，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也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这一点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历练，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从一点看，邓拓是有一定勇气的，只是不幸误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这个不能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集团，他命运的悲剧才不可逆转。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

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话破灭，毛泽东从神坛走下来，邓拓若地下有知，不知有什么感想？

□ 原载于《民主中国》2004年8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